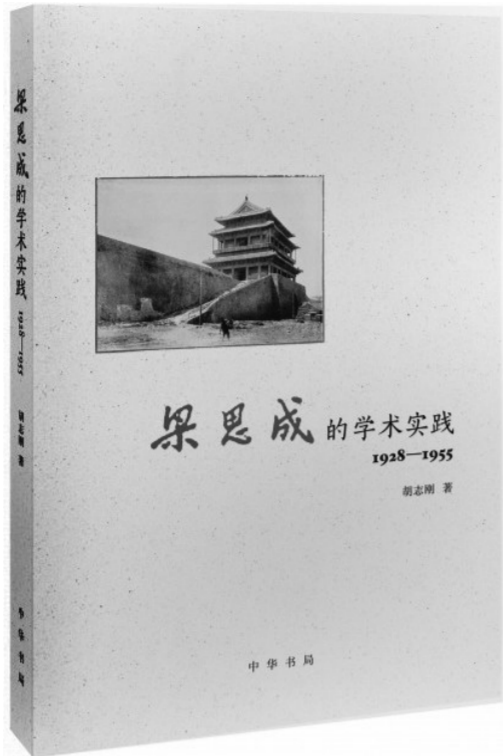


梁思成的学术人生

胡志刚



很快便验证了梁思成在“梁陈方案”中的忧虑，以旧城为中心的规划发展实践以及与之相伴出现的人口激增、房屋无序建造、交通堵塞等问题与古都风貌维护、文物建筑保护之间构成了无法破解的矛盾。面对这些无解的难题，虽然梁思成不惜以政治命运为代价，竭力争取留下北京城墙、跨街牌楼等文物建筑，但他应该很清楚最终的结局，因为这些文物建筑能够保存的前提已经失去了。梁思成的可贵也正在于此，即便失败，也要努力争取，因为这是一名学者的良知。如果对梁思成的学术人生做一个概述的话，那就是激情、执著、责任、无奈。

1930年代至1940年代，是梁思成学术生涯的黄金期，更是其学术成果迭出的时期。无论是梁同时代的学界同仁，还是后辈研究人员，大家都有一个基本共识，那就是，梁思成个人的学术成就和中国营造学社休戚相关。即便是朝不保夕、颠沛流离避难于大西南之际，梁思成依旧可以通过中国营造学社这个学术平台，延续自己的学术辉煌；同样，中国营造学社也因为有了梁思成、刘敦桢等人的加入和卓越领导，完成了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成为那个时代中国研究水平最高、学术成果最丰富、社会影响力最大的古建筑研究机构。客观而言，双方的合作对彼此都是莫大的幸运。

中国营造学社的谢幕与大匠的困惑

抗战胜利后，随着中国营造学社整体并入清华大学并停止运行直至不复存在，梁思成的学术生涯也发生了转变。虽然梁创建清华大学建筑系之初同样取得了很大的成就，1940年代中后期，其学术生涯的巅峰期延续了相当长一段时间。但和1930年代及1940年代初期相比，梁思成在这一时期的学术成果并不是很突出，产生较大影响的也仅有建筑教育思想及城市规划理念。究其原因，除了梁思成学术兴趣的转移外，学术平台的缺失，应该是最主要的原因。中国营造学社的谢幕对梁思成的学术生涯而言，影响之大难以估量。加之其他一些因素，梁思成的学术实践的巅峰期戛然而止，随之而来的则是无尽的困惑，以及学术实践处于下降态势的尴尬现实。

总结梁思成的学术实践，其实有一条简单清晰的线索，那就是恪守学者本位，以专业精神专心致志地从事自己熟悉且擅长的学术研究。这是梁启超反思自己人生经历后对子女的教诲，也是梁思成早年始终遵循的处世准则，1950年代以后梁思成的学术实践乃至人生际遇则从另一个角度对此做了进一步的解读。建筑学家究竟如何处理与政权、政治及政治家的关系，或许，这才是梁思成晚年的困惑所在。相信这一问题也是绝大部分有成就的建筑学家终其一生都要面对和思考的问题。

事实上，1950年代初期，梁思成的学术实践活动基本上是围绕“梁陈方案”展开的。梁思成以北京城为载体，建构一个古都保护与未来发展的理想范式，包括城墙保护、牌楼保护、团城保护、建筑的民族形式的实现、古都风貌的维护等，皆在此范式之内。实现这一范式的总前提是北京整体城市规划放弃以旧城为中心，在合适的地点建设新市区，并将首都行政中心区设置于新市区。这个范式的提出既是梁思成对欧美国家古都保护经验的积极借鉴，也是其对于北京城市规划设计的创造，前提如未实现，之后的一切努力都难以如愿。后来的北京城市发展历史

期，梁思成联合规划学家陈占祥提出了“梁陈方案”，勾勒出北京规划与建设的基本框架，同时在文物建筑保护、探索建筑的民族形式的有效实现路径方面亦有较多著述和实践，但遗憾的是，其学术主张大多不被认可，在北京城市规划、文物建筑保护等领域亦逐渐被边缘化，失去了学术话语权。可以说，新中国成立前后至1955年，梁思成的学术实践处于明显的下降态势。

应该说，对待学术研究，梁思成始终充满热情，但现实的境遇是他无法预测的，其学术生涯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发展趋势，就像一条完整的抛物线，前一时期呈现出明显的上升态势，后一时期则呈现出明显的下降态势。1930年代，梁思成首次开展野外古建筑调查，发现了建于1000余年前的辽代建筑——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在此基础上撰写的《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赢得了学术界的广泛赞誉，“不仅一举超过了当时欧美和日本人研究中国古代建筑设计的水平，而且就透过形式深入探讨古代建筑设计规律而言，也超过了日本人当时对日本建筑研究的深度”。到1937年抗战爆发，梁思成及中国营造学社成员已在华北、华东、西北等地开展了大量的古建筑调查测绘，基本梳理出了中国古代建筑的发展脉络，还幸运地发现了一座保存完好的唐代木结构建筑——五台山佛光寺。尽管抗战时期中国营造学社遭遇严重的生存危机。可以说，从1930年代到1940年代，虽然屡经磨难，但梁思成的学术实践始终处于上升态势，其主要学术成就大多完成于这一时期。1949年，新中国成立，古城得以完整保留，他非常希望自己的学识能在北平的建设中发挥作用，也非常希望自己的学术观点能在北平的未来规划与建设中得以实现。1950年代初

冰心《春水》完整手稿时隔95年日本再现

本报讯 近日，日本九州大学网站发布了一条消息，在中国近现代文学研究界引起不小的轰动。据日本九州大学研究生院语言文化研究所教授中里见敬的研究团队近日确认，九州大学附属图书馆滨文库内收藏的《春水》手稿为中国著名现代作家冰心的亲笔手稿，从其执笔至今，已有95年的历史。

据介绍，这份《春水》手稿是冰心（1900—1999）在22岁时创作的原稿，是中国现代文学非常重要的研究资料。

《春水》是冰心的代表作，也是中国新文学初期自由体诗歌的重要作品。手稿完成于1922年11月，1923年由新潮社出版。手稿大小尺寸为17.4厘米×13.0厘米，以毛笔小楷竖行双面书写于无格宣纸，依次为：封面1页、周作人题记1页、内题1页、自序1页、《春水》诗作正文115页，线装成册。手稿字迹秀美娟丽、流畅雅致，保存状态完美。据悉，在目前已知的冰心存世手稿中，该手稿创作时间最早、保存最完整。

《春水》手稿一直藏于日本九州大学图书馆，此次时隔95年浮出水面得益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于2016年第11期刊发的《1939年周作人日记》。

顾维钧珍贵档案“回家”

本报讯（记者胡克非）近日，由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全球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顾维钧家属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合作，决定完整复制这批档案。经3年努力，顾维钧生前捐赠给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第一批档案250余箱，已全部由该大学组织完成高清扫描，中国近代史研究所科研人员完成档案的编目工作，即将首次开放给学者利用，以促进20世纪中国史的研究，推动中美两国文化交流。

《别来无恙》新书分享会在京举行

本报讯（记者胡克非）近日，东方出版社《别来无恙》新书分享会暨“文艺现场”沙龙在北京举行。电影人、编剧程青松、北影策展人、电影学者沙丹以及《别来无恙》主编安宕宕，出席了本次活动。

《别来无恙》一书集合了知名高校的电影专业硕博、影视从业者对香港电影的研究，从内容上确保了本书的专业性与可读性，文风多样而不呆板。该书写出了一代人对于港片的记忆，写出了许多青年人心中的港片情结，以及影迷对港片的一片深情。谈到本书的创作初衷，安宕宕坦言，今年恰是一个适合重温旧梦的时间，作为一个香港电影的忠实粉丝和影评写

“微文体”新书《撒满阳光的路上》面世

本报讯（实习记者赵若殊）“微文，一个互联网催生的新文体：杨为民《撒满阳光的路上》新书推介会”近日在北京举办。湖南广播电视台副总编辑杨为民、爱音斯坦FM董事长解卿就移动互联网时代下，“微文体”出现的理论依据和文化传播意义展开探讨。

《撒满阳光的路上》是杨为民创作的千字微文集，主要记述其工作和生活感悟。他说：“落笔成文后，配图发布在微信上面，日积月累便有了这本微文集。”

齐鲁书社推出禅意哲理系列丛书

本报讯 近日，由齐鲁书社出版的禅意哲理系列丛书《禅语人生》《禅说处世》《禅解情缘》一经上市，就以其优美的文字和精美的插画获得媒体和读者的好评。作者一路开花，原名李兴海，国内美文作家，其作品曾获2013年冰心儿童图书奖。

周汝昌先生曾说，儒家的《论语》智慧，说到底，其实就是两个字，体贴。真切地站在别人的角度，去思考别人的处境。今天的我们，很难做到这一点。网络上到



冰心及其《春水》手稿封面（图片来自网络）

日记中记载：周作人在清理书斋废纸堆时，发现了当年自己编辑出版的冰心女士的《春水》手稿，于是以蓝纸封皮线装成册，并亲书题记，寄给日本后辈友人滨一卫。

据悉，滨一卫后来成为九州大学的中国文学教授，1984年去世。1987年，九州大学图书馆收藏了滨一卫的藏书及其他文献资料，建立“滨文库”。《春水》手稿自在其中，但一直没有引起注意。直到去年底《1939年周作人日记》发表，中里见敬才从未刊资料中找出《春水》手稿，并进行了一系列考察。

中里见敬表示，冰心《春水》手稿是中日两国文化交流的重要见证和具有象征意义的宝贵资料。据悉，该研究成果已于日前刊登于2017年第6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赵晓林）

部职业生涯。

2014年初，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顾维钧家属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合作，决定完整复制这批档案。经3年努力，顾维钧生前捐赠给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第一批档案250余箱，已全部由该大学组织完成高清扫描，中国近代史研究所科研人员完成档案的编目工作，即将首次开放给学者利用，以促进20世纪中国史的研究，推动中美两国文化交流。

活动中，首次对公众展示了“顾维钧档案数字化项目”的部分成果，并邀请中美两国顾维钧研究及中国近代史学者、专家参与“顾维钧与近代中国”学术研讨会。

拾音阁

卿佳否？此恨何深

——读蒋勋《手帖·南朝岁月》

张素闻

南朝岁月，在很多人印象中，是魏晋风度，是竹林七贤，是阮籍哭路旁，是嵇康的广陵名曲，是谢安的嗑破履告，是王羲之和他的兰亭雅集，是王羲之的“乘兴而来，兴尽而返……”王谢堂前，文人雅事仿佛把南北朝战争的现实隐藏得悄无声息，把世事艰辛、政事凶险、人事无奈、情事冷暖、身心仓皇都付诸东流，数篇文章。在偏安的岁月里，曲水流觞，慨当以慷，杜牧所见江南春风烟雨中的四百八十寺，与蒋勋所凝视的那些手帖却展现出不同的兴味与心得。蒋勋所著这本《手帖·南朝岁月》较接近于墨迹之后可以想见的真实生活，而非审美化、艺术化的南朝岁月、魏晋风骨。

手帖是文人之间往来的书信，因为书法之美，流传下来，成为后世临摹写字的“帖”。也因此，手帖连接了中国美好的书法与文学，它们历经了岁月的洗礼，散落在历史的尘埃中，现今所能得见的仅是只言片语，蒋勋却从这些只言片语中，寻找历史发展的脉络，追寻曾经写下手帖之人的心境。真实的生活里，名士有尴尬，才女也有诸多不幸，它和《世说新语》与《晋书》一样，有其精致

优雅又耸人听闻的八卦，更有其耐人寻味的解读空间。因《平复帖》而言及二陆——陆机与陆云，武将出身的他们以诗赋闻名于天下，却因复杂的政治纷争而被诛杀，暴虐的场景如王羲之的《姨母帖》一般催人心肝，贺循好几次“辞疾去职”，顾荣更是战战兢兢，那其实是那个残酷的时代，从手帖里才能想见那些艰难和困顿。张翰的秋风莼菜羹，则是千百年来文人士大夫们在官宦职场跌打滚爬时最温情的向往。才女谢道韞回娘家说：“天下竟有王郎这样的人。”（王郎指王凝之，王羲之长子——编者注）那一定是极为复杂、难以言说的婚姻吧。

抵面相逢，历史的意义在于映射了我们自己。世事的淘汰与岔岔的路途上的他们，与现在的我们又有什么差别？东晋永和九年，在山阴的兰亭，群贤毕至，少长咸集，王羲之与股浩都在其中。那时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觴一咏，畅叙幽情。股浩本来隐居十年，辩才无碍，若继续做一位山林高士，概是一世清名享誉不绝，而他奉当时会稽王司马昱征召入朝为将，率领七万大军北伐。王羲之就当时政局诚恳告之，谓为不可，股浩果敢，再敢于政敌，待政敌袒温不计前嫌，想请他再度为任，他感激异常，竟然把一封写好的信打开读一遍又一遍，如是往复几十次，最终只寄了一个空白信函，惹怒袒温……股浩在日常生活中究竟如何行事，以至于辩才无碍的他竟至于如此患得患失？“我与我周旋久，宁做我”，到底他要做的哪个我？当我们处于此种生死存亡之际，是走向山林，还是奔赴战场？

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手帖的深情，恰在“此恨何深”中得以展现。如王羲之《执手帖》：“不得执手，此恨何深。足下各自爱，数惠告，临书怅然。”此外，书中蒋勋的解读常常令人痛感人世之苦，他竟得《奉对帖》的王献之像“一个撒赖的弟弟，失去了姊姊，悲哀到不想活下去了”。王献之跟都道茂结婚多年，幸福快乐，自以为可以白头偕老：“虽奉对积年，可以为尽日之欢。常苦不尽触类之翰。方欲与姊极当年之匹，以之偕老，岂谓乖别至此！诸怀怅塞深，当复

